

新质生产力，如何在实践中成长

王一鸣

新质生产力，一个全新和鲜活的概念。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其放在更宏大的视野中去观察和把握。

人类发展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呈现以人工智能为主体，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加快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而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基因组学、脑机接口等领域也在孕育新的重大技术变革，这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带来生产力“质”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不可能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既要摆脱传统增长方式下粗放扩张、低效发展的生产力发展路径，又要拓展先进生产力发展空间。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路径、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取得进展，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新质生产力已经在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孕育成长，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可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求变，也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

202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阐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是新时代新征程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概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由以下变革催生：技术革命性突破——与以往科技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替代体力劳动，还将实现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对人的智力的拓展。比如，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催生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实现制造过程全要素各环节的动态感知、互联互通、数据集成和智能控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高流动性、低复制成本和报酬递增特征。数据参与到生产要素配置中，能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比如，通过大规模采集数据，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使产品供给方更为清晰地认知需求方向、对象、内容及数量，并在不增加传统要素投入情况下实现更高效的产出。可以说，数据要素加入生产要素配置，形成了更多更好的生产力产出。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汽车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在传统汽车领域，西方国家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但这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在全球竞争中异军突起。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换轨超越，正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泡沫化，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产业基础、科技条件和创新能力来发展，不搞简单化、一刀切，不搞一种模式。要避免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处理好几个方面关系。

第一，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从科技创新的规律看，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仅要重视“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同样要重视“从1到100”和“从100到N”的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在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上协同发力。一方面，要鼓励实现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另一方面，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和应用场景丰富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供需对接和合理匹配，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到现实生产力。

第二，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但决不能忽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一定是落后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同样可以焕发出新质生产力。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近年来，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5G+工业互联网”孕育智能制造新的应用场景，传统产业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政府引导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政府的谋划和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行政力量来直接配置资源。从过往的经验看，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往往容易形成“一哄而上”，造成资源错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由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资金投入大，在这些领域出现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会更大。因此，政府要从过去依靠行政力量抓要素供给和项目建设转向培育良好创新生态。实践证明，创新生态比创新资源更重要。因为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良好创新生态，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创新潜力就会充分迸发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第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多层次体系。一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为科技创新提供精准服务。二是探索金融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拓展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释放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三是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水平，运用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与产品线上化，降低金融服务科技企业的隐性成本和风险。

第五，发展新质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同样重要，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动态的，改革也要与时俱进，按照“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要求，围绕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第六，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迫切要求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升。要加快智能劳动者等新型劳动者队伍培养，加大全社会劳动者的数字知识、数字技能的普及力度，以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智能劳动者职业技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人力资本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汇。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这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之际，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入学习把握，并转化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如何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

姜照

中释放期。据测算，我国每年汽车、家电换代需求在万亿元以上级别。推动新一轮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充分尊重消费者意愿的基础上，引导消费者淘汰掉老旧消费品，更换功能更加完善、品质更加优良的消费品，既能顺应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能激发居民消费潜能，撬动消费增量空间，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另一方面，这也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能为产业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助力。随着消费品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的逐步提高，传统生产模式已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为了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企业会不断推动生产技术创新、高效利用生产要素，助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更好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夯实基础。例如，居民对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健康家电等消费品需求的提升，将促进企业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提升创新能力。又如，基于消费者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反馈数据，企业能更好使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根据消费者偏好优

化生产流程和产品设计，提升生产效率和供需适配能力。

近年来，绿色消费理念已逐步渗透到居民的衣、食、住、行、用等多个领域，但进一步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还存在一些堵点。旧消费品回收链条不够畅通，绿色低碳服务标准、认证、标识体系仍有待健全，等等。推动新一轮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需进一步解决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堵点问题，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在推动以旧换新过程中，通过加快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来促进企业加强对旧消费品的回收利用，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又如，在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等重点消费品领域，整合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等资源，健全相关标准，倡导购买和使用绿色消费品，提升消费的“含绿量”。

一段时间以来，以旧换新的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9日24时，全国汽车报废更新近270万辆，汽车置换更新超310万辆，超3330万名消费者购买相关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5210万台，家装厨卫“焕新”补贴产品超5300万件。进

一步放大以旧换新的政策效应，需更好把握居民消费升级机遇，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努力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一是充分发挥经营主体作用。引导生产企业加强消费品研发设计、推动产品性能的迭代升级，鼓励流通企业利用线上线下渠道设立以旧换新销售专区，同时支持再生资源回收领域龙头企业发展。二是落实财税支持政策。以财政资金支持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支持企业开展促销优惠活动，更大力度推动消费品置换更新。可以考虑落实“反向开票”等惠企政策，让企业得到“真金白银”的支持。三是发挥金融支持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聚焦以旧换新领域开发产覆盖、差异化的消费信贷、保险产品，合理确定消费信贷产品的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和还款期限，完善保险产品的定价和理赔管理。四是营造良好环境。加快完善重点消费品领域的标准认证体系，鼓励各方采信认证结果。引导行业加强自律性监管，完善消费者权益办理反馈制度，合理保障消费者权益。（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把握高校教师评价的根本之道

陆廷青

建构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参与意识，更好地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这些工作开展得好不好，最重要的基石就在于评价体系是否有引导教师树立起甘为“孺子牛”的价值观。可以说，做好孺子牛，就当不成乐教擅教的优秀教师。

二是开拓创新，争当发展“拓荒牛”。拓荒这个行为的本质就是对新领域、新事物的探索，必须以开拓精神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为引领。评价教师不仅要科学计算其教学科研工作量，更要考察其工作是否具有充足而活跃的的创新要素。科研工作中，不论是从0到1到N，还是从N中探索1到0，无疑都要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教学工作同样需要强化创新，因为学生是鲜活的生命体，要浇灌以活水，从而启发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不论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还是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探索，都应坚持创新发展，结合学科前沿、洞察时代变化。

三是嚼得菜根，愿做勤恳“老黄牛”。老一辈革命教育家从旧到新建设起人民教育，而今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筚路蓝缕的历程离不开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的价值支撑。新时代的高校教师一方面要具备以德为首的综合素质，在传道授业解惑中涵育学生的品质素养，在科技创新转化中滋养自身的情怀品质；

另一方面教师要胸怀“国之大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感，切实扛起新时代赋予高校的新使命挑战，探索不止、传灯不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当然，在建立新型教师评价体系的实践过程中，不但要明确“怎么看”，也要明晰“怎么办”，以“道”正求“术”长。

高校教师要精于“学术”。当前“破五唯”的旨在在于破除单一评价指标的极端化，而不是摒弃论文、专利、分数等客观要素，更不能降低水平削足适履。任何评价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支撑。高校教师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教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产出一流人才、一流学术成果与社会贡献为目标，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勇攀学科领域高峰，不断增强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以扎实的工作、坚实的成果、充分的业绩来呈现自己的“牛”。

除了成果本身，还可以通过考察学界认可或社会反响情况来开展评价。这里的“有人”不一定是学者，甚至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我们既可以通过评价客体学术成果的引用情况或奖励奖项上的认可程度，也可以看其成果是否为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等方面带来正面效益，教育教学是否得到业界解感中涵育学生的品质素养，在科技创新转化中滋养自身的情怀品质；

出评价客体价值的体系脉络，也是构成多元评价的一个重要层面。对高校教师进行学术评价的具体人选，既可以是个体的资深科学家或教育家，也可以是群众集体意志的体现。科学研究鼓励敢为人先，就意味着工作面临长期性、艰苦性、难以预测性的可能，或者非共识性成果的意义短期内无法被正确理解和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同事间可以借由对评价客体的学识积累、前沿意识、创新思维、工作状态、投入程度等多方面的了解而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可由具有深厚科学素养和前瞻性判断力、长期奋战在一线的科教大家对评价客体的成果突破性、先导性给出专业判断。这在一些需要长周期工作，鼓励“有风险的探索”、接受“有价值的失败”时尤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战略科学家履职尽责和一般性评价效果不彰、结果不准时的重要补充。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时代责任和现实要求，高校在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工作中要紧紧牵住教师评价改革这个“牛鼻子”，发挥“三牛”精神，道术相济，科学构建起符合教育规律、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实际、评价主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机制、评价方法等多要素协同的评价体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南京大学副校长）

以“三个统一”推进清廉校园建设

马寒 王宜可

员的廉洁作为一项基本纪律要求和党性衡量标准。从实践上看，建党100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洁信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廉洁自律、清正廉明作为行为准则，自觉抵制腐朽思想、腐败行为的诱惑和侵蚀，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探索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高校是党领导的高校，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必须把立德树人放在治校办学的首位，把“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作为首要任务。这就要求高校应将廉洁信仰教育的“软”约束与法治教育的“硬”约束结合起来，以系统化、道德教育、纪法教育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目标。第一，应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课堂、进教材、进师生头脑”的工作，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教职员工和大学生，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价值观，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第二，应着力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形成信仰法律、尊重法律、按法律办事的良好法治环境；通过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活动，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牢固树立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基本道德准则，不断增强廉洁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廉洁理论研究与**廉洁实践的统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较之于其他社会组织有其特殊性。从近年来公

布的我省高校违规违纪典型案例来看，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案发频次较低，但社会影响大；二是涉案人员低龄化趋势明显；三是案发岗位由教学管理、学生服务、后勤保障等重点领域向非其他非重点领域扩散。有学者认为，高校腐败问题具有独立生成的自因逻辑。既包括理想信念缺失、集体道德缺失、法纪意识淡薄等主体因素，也包括制度执行虚弱化、监督问责轻量化、法纪宣传教育与反映反馈形式泛在化、政治生态人情化等条件因素。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复杂性，要求必须将廉洁理论研究

与廉洁实践统一起来，深入探究其生成机理、发展趋势和治理路径。第一，应

将我们党百年治党实践中积累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法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的理论精髓融入高校廉洁理论研究，从党的百年理论发展史中汲取理论滋养。第二，应将高校廉洁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对接起来，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三，应把握

好高校廉洁文化的实践特点。高校廉洁文化的基点是预防腐败，即从文化层面上分析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从反面案例中研究腐败滋生、形成、发展的规律，通过正反典型教育，达到规范和警示教育效果。围绕这个基点，高校廉洁文化

实践应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四个层次进行规制和建设，使廉洁文化实践既具有社会文化的共性，又体现高校文化的特点。

三、普适性廉洁教育与特色廉洁文化建设的统一

文化的魅力在于个性鲜明、各具特色。个性和特色是增强廉洁文化吸引

力和感染力的基础。每所高校、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因此清廉校园建设要将普适性廉洁教育与特色廉洁文化建设统一起来，在开展以课堂教育、社会实践、校园活动为主体的普及性廉洁教育的同时，依托各高校以及高校所在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挖掘本校、本地人文积淀，着力推进具有各校各地特色的廉洁文化建设。目前，全国已有不少高校在廉洁文化融合建设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河南省南阳市高校的“忧乐”文化、“得失”文化”等。这些高校借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文化和“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等饱含丰富廉政思想的楹联文化，对师生进行廉洁教育。四川南充、广安、达州以及陕西延安等地高校充分发挥当地“红色廉政文化”的教育作用，积极开展“重走红军路，重提入党誓词，重唱红色歌谣”等活动，将“红色廉政文化”作为本地高校特色廉政文化。就河南而言，灿烂的中原文化为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开封的“包公文化”“焦裕禄精神”、安阳的“红旗渠精神”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地方高校应当加以开发和利用，通过深度融合体现廉洁文化建设和廉洁教育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点。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河南省廉政专题研究项目“高校‘微腐败’精准惩治对策研究”的阶段成果，编号为2024LZZD-15）